



科幻理论研究

本土批评范式的不断深耕

刘阳扬

2025年科幻研究的共同关注点在于建立本土理论话语。一方面,通过回到“科普批评”“科幻现实主义”等已有明晰理路的研究范式,梳理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历史路径;另一方面,突破哲学理论、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乃至科学理论的边界,以“具身认知”“赛博叙事”“数字生命”“人工智能伦理”等视角,结合中国现实,观察当代尤其是21世纪科幻创作,也逐渐成为路径清晰的研究方式。

文学的边界在2025年不断向外扩展,虽然学界对其中出现的“泛化”趋势已经有所警惕,但新大众文艺、大文学观等概念的确为科幻创作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科幻文学自诞生以来便在各类文学规约之间艰难生长,而今文艺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科幻文学因而有了突破原有文类限制、与其他艺术门类直接对话的机会。因此,科幻文学与网络文学融合,与影视、游戏等联动,融入文旅产业开发,在与种种文化形态碰撞、交融中自然地展现了新的文化价值。

本土科幻批评范式的体系化与理论创新

研究并弘扬科幻文学的中国特色和民族个性,建立起本土化、谱系性的科幻文学研究体系,一直都是科幻研究界持续探讨的问题。吴岩自踏上科幻研究道路伊始,就一直关注着科幻文学的理论体系,他在2011年的《科幻文学论纲》里,就试着搭建起科幻文学的理论框架,不仅把科幻作家们分类整理,还从边缘与中心、话语与权力等角度,勾勒出科幻创作的整体格局。到2025年出版的《科幻文学研究手册》,吴岩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科幻,将科幻文学定义为科学话语和未来想象双重介入现实的叙事场域,进一步梳理中国科幻的历史脉络,以及近期在影视改编中大放异彩的故土情结和东方智慧。

在论文《论中国本土科幻批评的流派和特征》中,吴岩又进一步总结出中国近些年科幻批评的三大核心范式:科普批评、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和“后革命”批评。科普批评常常被视作中国科幻批评的源头,在“五四”时期和1950年代能够为新的科学变革提供相应的话语资源。而科幻现实主义批评如今也已经在科幻文本的批评中被普遍运用,这一理论历经了几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从表现现实到重塑创作范式的演进路径。而“后革命”批评则成了当下科幻研究的新兴范式,这一范式聚焦文本里的中国现代性独特经验,揭示出历史记忆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互动,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詹玲在《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认知逻辑转型与新叙事诗学建构》中,试图脱离西方的科幻研究范式,用中国本土的理论框架总结出中国科幻小说科技想象的发展形态。她主要分析中国科幻文学要如何摆脱传统认知逻辑的束缚,在现代理性科技的基础上普及相关知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江玉琴的《技术与文化的另类探寻: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赛博叙事》,从中国当代科幻中的现代科技、反英雄形象入手展开研究,探讨现代技术如何和传统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中国独有的赛博叙事路径。

新大众文艺浪潮下的科幻跨界实践

新大众文艺是2025年的文学热词。科幻文学本身就具有跨媒介传播的天然特质,又恰逢人工智能时代,二者相互促进、彼此放大,故而科幻文学更易于与网络文学、微短剧、游戏、素人写作诸种形式结合,在大文学观的推动下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参与者。

李啸洋在《文艺报》发表《古典的未来:新大众文艺中的科幻生产力》一文,梳理了中西科幻文艺和大众之

间的关联,还提出中国科幻需要通过古典神话体系的科幻转译,打造出基于本土的全新科幻创作范式。在此基础上,《钟山》编辑张鑫还在《文汇报》组织了“新大众文艺与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专题,邀请王明宪、朱霄等青年学者围绕该话题展开讨论,讨论围绕科幻文学的当代使命、古典资源与现代转化、小众与大众、先锋与主流、理论与实际等维度展开,既梳理和总结了科幻文学的大众传统、审美范式、创作转型和形式实验等方面的内容,也对科幻文学在新大众文艺中的发展前景予以期待。

科幻创作通过跨媒介改编传播,完成经典IP转化,获取产业价值,是创作者、研究者和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鲍远福研究网络科幻多年,他发现网络科幻有独有的叙事逻辑,比如,通过具身式主体游历的方式,形成仿真的未来生活经验,或者通过“烧脑”的想象形成多维的世界观体系。这些叙事逻辑延伸出的“未来神话”式叙事,能够给影视、游戏、剧本杀等提供丰富的改编素材。

科幻理论研究离不开创作的发展,从学科角度而言,研究科幻创意写作教学与实践,成为文学界与教育界的交叉热点。开设创意写作课程的院校,通过通识教学、刊物联动、作家交流等模式,培养大学生科幻写作的兴趣和写作能力。何敏在《创意写作如何教?——以电子科技大学科幻创意写作教学实践为例》中,搭建起了包含课程体系、创作实践、校园文化三大维度的科幻教育平台;姜振宇在《科幻创意写作的结构困境与破局方向》中提出科幻创意写作从文学到文化产品的生产链条仍不完善,未来需要从建立创作语料库、制定评价标准、加强行业调研、强化产业合作等方面逐步推进。

人工智能时代的创作伦理与后人文反思

随着《天使命徒》《记忆之地》等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小说进入公众视野,AI时代的文学成为2025年文学领域讨论的中心,科幻文学也遇到了从“写人工智能”到“被人工智能所写”的尴尬转折点。因此,学界对人工智能冲击文学的迅猛态势展开系统讨论:面对科技的挑战,是以对抗性姿态坚守写作的初心,还是主动走入数字洪流,改变当下的书写习惯及思维模式?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数字人文分会举办的“面向数字文明的科幻文艺与AI人文研究”论坛,明确点出当前发展阶段已完成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而AI介入人文研究,带来的变化不停留在工具方面,而是触发人文研究模式的整体调整。在科幻文艺创作中,也已经出现以大语言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为基础的人机共生的协作模式,这种“后人类范式”的生成方式,或许还会推动文学向“后文学”方向转变。

成渝两地高校多年来自觉地以工作坊形式促进不同高校科幻研究群体的学术交流,第四届成渝双城科幻研究工作坊也把智能工具及跨界写作作为讨论焦点。主旨演讲中,李怡对AI写作对人类创作主体性、价值标准、文明自信等方面的冲击做了梳理,而蓝江则提出了“代码即权力”的观点,他表示在世界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展开之后,人类主体可能成为自动化社会程序中的一个微小单元。

2025年具体科幻文本的相关研究,多从后人文主

义、技术哲学方向展开讨论,分析科幻文学对“人”原有定义的调整及技术伦理边界等问题。吕广钊以麦克尤恩的作品作为切入点,认为科幻文学中的仿生人并非单纯的机器,而是由“非物”构成的复杂能动网络,人类也将突破身体局限,走向一种“数字化”的存在;王一平在《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的数字世界与数字生命》中,介绍了“数字孪生”“人类+”等数字生命形态,阐述了这些形态正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融合性的认识世界的新框架。

科幻文学的史料发掘与文学史重释

科幻文学的史料研究近年来有十分扎实、清晰的进展:资料库建设使科幻文学自身的历史资源大大丰富,因此科幻文学的发展脉络日趋明确,而史料研究本身又有利于补充、完善现有文学史版图。具体而言,晚清科幻研究触及“觉醒时代”科学观念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抗战及“十七年”时期的科幻研究则从1940、1950年代的科普活动出发,对科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做了颇有洞见的考察。

李广益一直在关注科幻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他在2015年就呼吁重视史料工作,并发表了《史料视野中的中国科幻研究》一文。2024年,李广益在总结了十年来的科幻史料研究后提出,科幻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应该成为一种思考和表达方式。2026年刚开学,李广益和贾元元、三丰一起,在《文艺报》展开了科幻史料的三人谈话,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科幻数据库,给广大研究者提供研究上的便利。贾元元深耕晚清科幻,他所著的《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1891—1949)》,对中国科幻理论类史料做了系统汇编,书内收录了论文、序跋、发刊词、书信、广告等内容,也把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的发展脉络清晰呈现出来。任冬梅的《晚清: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发端》则分析了晚清科幻对未来的想象与建构、对技术的关注和在对创新的不断追求。

抗战时期和“十七年”的科幻研究一直慢慢升温,顾忆青就以威尔斯《未来世界》在抗战时期的译介作为核心案例,系统梳理了这部作品在国内的翻译传播历程,还揭示出了科幻译介在抗战公共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肖汉的《承接开拓与时代脉络:“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研究(1949—1966)》,通过梳理科幻的创作生态与文本特征,探讨了科幻与国家政策、科学普及的互动关系,给本土批评范式的历史溯源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支撑。

2025年的中国科幻理论研究既有对历史细节的梳理,又系统地讨论了人工智能、大众文艺中的人机伦理议题,但就目前来看,很多话题尚处于未完成状态。而随着人工智能写作生成的质量不断提高,有关主体性、具身性的讨论自然也会继续深化。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写下:“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当下的语境中,人类所持的主客体重叠身份的边界愈加模糊,算法大模型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已经超越人类本身,数字身份活动的频率也远超肉身身份。因此,或许正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个“比科幻更科幻”的现实世界了。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新观察

一种文学概念的提出,必建立在坚实的创作基础之上,否则,概念便很容易沦为装置、装饰乃至泡沫。同样,受着某一概念的引导,创作不自觉地形成某种趋势,走向,形成不断壮大的文学实践和良性的文学生态,如此概念才有可能上升为理论,被证实、收纳和典藏。近年来,林林总总的科幻文学概念中,能实现上述两种有效循环的,应当就有“科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了。尤其在通读华语科幻星云奖第10至15届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后,我感到,科幻现实主义不再是一棵瘦弱的嫩芽,而已经长成了一棵葱葱郁郁的青壮之树。

严肃文学往往探讨人的日常生活,科幻小说却几乎很少在生活细节层面流连,即使是科幻现实主义小说,也只能部分地展现生活某些侧面。这里的日常书写更多地指主题上的生活化和手法上的生活化。就前者来说,顾适的《择城》和程婧波的《且放白鹿》具有代表性,两者抵达科幻文学和严肃文学的边界,因此获得不少纯文学研究者关注;后者如阿缺的《彼岸花》《忘忧草》,以化“恐怖”为“日常”的笔法达成一种温暖叙事,因而别具一格。

时间是线性的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在习惯了各种次元文化内容灌输的当下年轻读者看来,“时间可以倒流”“未来可以穿越”也许正在成为新的认知。那么,关于“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科幻小说,如宝树的《退行者》、陈楸帆的《人生算法》就显得非常“现实主义”了。程婧波的《去他的时间尽头》则采取另一种写法,把时间设定成一个闭环,把打开这个闭环作为“一切可以重来”的“如果”之键。不同于上述思路,王侃瑜的《随时》不留恋“时间”这颗彗星美丽的尾巴,却对它即将到来的撞击忧心忡忡。上述作品由于具备高密度的思想含量,又在结构和语言上实现了科幻与现实的完美嵌套,成为科幻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品。

与科幻未来主义向往高空深空,动辄进行星际航行的宏阔写法不同,“近地书写”构成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所谓“近地书写”,一指表达上的贴地滑翔,生活气息较浓,二指它们的叙述空间都离地球不算远。温温《失重的语言》中的空间站处于近太空,万象峰年《湖风吹过广寒月》、迟卉《不做梦的群星》、程婧波《宿主》涉及的月球、金星、火星,在我们不断扩大的天文学认知中,它们已然成为我们的“邻居”。而且,不论是《失重的语言》以旧日回忆勾连故事,还是《湖风吹过广寒月》以家庭露营地、以女儿的想法破题,都显示出现实之于科幻的锚定作用。

“近地书写”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带有“乌托邦”色彩。小说最初大都聚焦地球之上某处奇妙所在,“在地性”明显,时至今日却出现异变。温温《解控人生的少女》中未被互联网浸染的锡曼屿,或许还是我们熟悉的实体“桃花源”;顾适《赌船》中不曾被扰乱时空的坤城茶馆,已经属于无妄之物;而索何夫《桃花源记》中孤悬宇外的桃花源星,就更具反讽意味——于此,乌托邦完成了由实体到想象、“在地”到“近地”的自如切换。值得关注的是,科幻小说既然遥望星辰大海,那就和土地联系微弱,遑论土地之上的某块地方。但有些科幻写作打破了这一论断,阿缺《重庆的尽头是晚霞》延续了作者的温暖叙事,力图把生活最温馨美好的一面给人看,冷、硬、高、强在他的故事中不存在,一切都是那么朦朦胧胧、可亲可爱。作家把诗意赋予那个本来冷冰冰的移城计划,名之曰“晚霞”,地理上的尽头和城市命运的尽头,都因科学与诗意、人文精神的交辉而熠熠闪光。

基于“思想实验”的文体定位,不少青年作家将科幻小说视为“试验场”,进行人文思想碰撞和表现形式探索,科幻现实主义因此也显现出斑斓色彩。以段子期《重庆提喻法》为代表的小说,常将“先锋”建立在“日常”之上,作品的纯文学浓度非常高,但硬币的反面是科幻色彩度不足,小说节奏也相对缓慢。这类作品常借助某个领域的冷门知识和理念介入文本,寻得足够的“陌生感”,行走于科学与幻想的“飞地”。如顾适《(2181序曲)再版导言》试图把科幻导入“序言”这一评述文体中,双翅目《宇宙尽头的茶馆》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物理学概念,挑战着乃至颠覆着读者对科幻小说的固有认知。这样的小说尽管艺术手法上不够成熟,却体现出科幻小说求新求变的文体活力,拓展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

论述至此,一个问题渐趋明了:到底是什么是科幻现实主义?以星云奖为观察对象,以中国科幻10余年来表现出的几大创作趋势为牵引,可以大胆提出如下想法:

首先,科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始终不忘观照现实、致力于技术批判的近年来、近空间写作潮流。日常化书写、地方写作圈定了科幻现实主义的基本表现范围,它和传统的严肃文学有交叉、重叠,乃至存在潜滋暗长的互相浸润。近地书写则限制了科幻现实主义的表现高度,这个高度是物理上的,而非思想上的,因为当科幻小说的表现范围突破到深空和星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实主义就很难在其中占据主要的位置。那里是科幻未来主义的表现空间。我们必须承认,未来主义是科幻的基本流派,但在理想状态下,科幻的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将会互相补充、协调发展。

其二,在科幻现实主义中,“现实”或表现为题材倾向,或体现为某种创作手法。科幻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显著的创作潮流,主要原因在于,科幻受到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影响,不自觉地向其靠拢。但科幻毕竟不可能是完全“现实”的,它是追求惊奇感、陌生化的文类,必定有推想、想象、幻想,那么“现实”就必然服务于“科幻”。有时出于反转,“现实”起到铺垫作用;有时出于掩饰,“现实”只是一层外壳;更多的时候,“现实”是思想的炮仗,它只是为了爆炸后的那声响而存在。

其三,科幻现实主义的思想滋养、美学营养来自中国传统,它的审美范式是中国的。中国艺术论强调“新奇”出于“平常”,中国古代文论家刘勰提出“以正驭奇”的说法,宋代文豪苏轼认为,好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清代文学家洪亮吉云“诗奇而入理,乃谓之奇”,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后人的审美思维。具体到科幻创作,“奇正相生”“奇而入理”是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的典型美学特征。欧美科幻发展至今,叙事资源日渐枯竭,美学理念日趋消耗殆尽,中国青年科幻作家要想打开创作的新天地,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样就会形成科幻文学的中国气派和风格。事实证明,这样的美学追求大有前景,且广受欢迎。

值得提醒的是,科幻现实主义表现出跨体裁的杂糅特点。许多文类如历史、奇幻、推理等都是可以与现实结合,但科幻现实主义一般呈现为“现实+推想”的固定结构。不少科幻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实验性和探索性,但需要在守正基础之上寻找创新点,而非标新立异,否则很容易沦为“实验废料”。同时,要特别注意科幻性与文学性的平衡,既不应为追求新奇牺牲文学性,也不应崇拜文学性而忽视乃至消弭科幻核心。

科幻文学无疑是时代的宠儿,每一个关注中国文学的读者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科幻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它业已突破类型文学的藩篱而兼具更复杂包容的思想内核。科幻现实主义恰是科幻文学的新形态,它将为新时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贡献。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现实的葳蕤之姿

卓一苇



声音

科幻还是科技的“预言”吗?

星河

经常看到有人提及“科幻文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但总感觉有些观点不够到位,甚至存在误区。科幻文学对科技发展的确具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绝非那种简单直白的实质性推动,恐怕更接近一种研究方向上的发散性启迪。

过去科幻界痴迷并感慨于科幻作品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准确”预测,大多经不起审慎的探究。一说到是A.C.克拉克的《太阳帆船》导致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对“太阳风”的研究,更不必说讹传了多年的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预测了潜艇。其实稍微查阅一下资料就可以知道:《海底两万里》最初发表于1869年,距此时间最近的法国“潜水员”号潜艇下水于1863年,美国“鸚鵡螺”号潜艇甚至问世于19世纪初;《太阳帆船》最初发表于1964年,而“太阳风”早在1958年即被研究且被明确命名。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即便从时间上看似顺置的事件,即科幻小说在前,科研成果在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启迪”的先后关联性。事实上,科学家往往比科幻作家的想象更为丰富大胆,他们经常会提出许多惊悚骇俗、令人咋舌的神奇构想;而科幻作家的创作是他们已有的知识结构、长期养成的阅读素养和想象力结合以后写出的一个个精彩故事,影响比科技文献、科普

作品更广泛。但读者不能止步于惊叹科幻作家的这种“预言”,反而忘记了最初提出构思的科学大师。

如上所述,科幻文学有时给出的只是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向。这种灵光乍现式的灵感突发,不一定适用于深入的具体科研,但却可以作为一种启发。因为这种灵感,或称之为科幻构思,不会受到教育水平、现实条件等的制约,尤其有利于用发散性思维促进学科间的融合。

2025年中国科幻银河奖颁奖期间,我曾与一名科学家深谈良久,提出了很多极端化的科学假设问题,但她都非常理性地予以解说,并以罗列不同可能的方式与我们进行认真研讨。我最后表示了歉意,但她丝毫没有关系,自己也借此获得了一些研究思路与方向。当然,假如科幻作者的科学素养实在太差,写出来的故事逻辑混乱,那么的确,再好的构思也经不起推敲。

其次,科幻文学是一种无成本的思想实验。在现实当中,一旦涉及人的实验,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需要秉持相当审慎的态度。然而,科幻文学却能在幻想中形成、改进甚至完成这种实验,并将各种进程和结果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事实上,科幻文学是把科学研究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它将科学研究具象化的同时,因文本规约,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现实条件的

限制。科研工作确实可以从一窥各种社会效果与伦理可能。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科幻小说中开展“田野调查”与“科研实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科幻作品中的预测,体现为多元的形式,这为思维实验提供了不同路径的状态与结果。因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毕竟有着多种可能。单从这一点来说,衡量一部科幻作品的成功标准也不是预测准确与否,因为有些预测只具有警世意义,那种情况我们宁愿它不会发生。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应该极力避免公众将科幻文学与真正的科技发展相混淆。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大多十分严肃,即便是在展望性叙述中,科学家也会严谨地使用“在未来”“有可能”“实现科幻作品中所写的情况”等字眼。无奈一经互联网媒介放大传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不用过分放大,只要把“在未来”“有可能”这类限定词省略,所传达的信息就会完全失真。尤其许多自媒体为了流量,将这些微小误读刻意放大,就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这样不但对公众形成误导,还会让原本相信科研近况的人不再相信任何真实信息,这就将严重污染科幻创作、科普传播的生态环境。这些都是我们尤其要注意和引以为鉴的。

(作者系科幻作家)